硝河城革命旧址

硝河城（今硝河乡），古名得胜寨，始建于宋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月8日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确定为第一批自治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硝河古城革命旧址）。

硝河城位于西吉县东南部葫芦河中流川道区，原西兰大道（今省道202线、国道566线）穿境而过。该城东靠绵延山峦，西濒葫芦河道，南北一马平川，地理位置特别优越，可攻可守，可进可退，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当年红军长征、西征的必经地、战斗地和安营扎寨地。

1936年9月14日，由团长阮金庭、政委萧锋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上午8时从夏家寨子出发，经硝河城，于16时到达将台堡宿营，在硝河城留下一个连驻扎并在西兰大道两侧担任殿后和警戒任务，向兴隆镇、单家集派出前哨连沿西兰大道探路警戒。同日，由师长陈赓、政委杨勇、团长陈正湘、政委袁升平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从固原进入，经沙沟、白崖、夏家寨子等，到达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一带驻扎并开展活动。9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团各连排分片、分地区、分工负责，开始执行打土豪，扩大红军，组建地方乡村党组织，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等任务，派驻硝河城的工作队驻扎40多天。9月29日，西方野战军为策应四方面军北上，对一方面军行动作出部署，以一军团二师附骑兵二团主力为左纵队，30日出动，经硝河城、单家集、隆静等地，袭占或攻占秦安。

1936年10月4日，奉西方野战军命令，由红一军团二师及骑兵二团主力组成的左路纵队，由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率领，到达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等地，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共同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在四方面军接替静（宁）会（宁）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尽量将胡宗南和东北军向西吸引，以利我军以后行动。红一方面军筹集粮草，赶制鞋袜等慰问品，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10月22日，由总指挥贺龙（兼红二军团军团长）、政委任弼时（兼红二军团政委）、副政委关向应（兼红二军团副政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团到达将台堡，与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首长及红一军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等亲切会面，并举行了盛大的一、二方面军会师大会。会师大会结束后，由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四师和由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六师移师驻扎于将台堡至硝河城沿西兰大道两侧的村庄。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也移驻将台堡至硝河城沿西兰大道一线休整。10月25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团移驻硝河城、夏家寨子、穆家营等一线休整。同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在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的率领下从兴隆镇出发，经将台堡到达硝河城宿营。10月26日，红六军团离开硝河城，移驻夏家寨子。10月27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团四师、六师离开硝河城，经夏家寨子、穆家营、袁家河、万崖子、黄家川、黑城河、新营、白城子等地翻越月亮山，出西吉境到达海原县的红羊坊、曹家洼一带。

硝河城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光荣而辉煌的革命史，其在红军长征、西征乃至会宁大会师、将台堡胜利大会师中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与将台堡、单家集、兴隆镇、公易镇、平峰镇一样，是“红色西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长征史、西征史、中国革命史、军史、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多彩西吉》）

简泉村郑家沟烈士崖

简泉村郑家沟烈士崖。（资料图片）

烈士崖位于惠农区燕子墩乡简泉村郑家沟北岸山崖之上。195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受命剿灭以郭永胜为首的土匪期间，不幸被捕的3名解放军在此宁死不屈跳崖壮烈牺牲。

烈士崖在简泉村一队的水库上方，山崖地势险峻。2017年，经简泉村村委会向村民征集，村民一致同意将3名解放军壮烈牺牲的山崖起名“烈士崖”，以纪念其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并铭记宁夏剿匪战争之艰苦卓绝。简泉村用红色油漆在解放军牺牲的悬崖上写了“烈士崖”三个大字。2018年6月，为进一步宣传和保护“烈士崖”遗迹，简泉村用石头砌筑了22米×22米的红色五角星一枚和17米×17米“烈士崖”三个红色大字，并利用太阳能灯进行亮化。2019年5月，相关单位又对“烈士崖”重新进行粉刷。随后，简泉村又在崖前以砖石垒砌高台，台上正中建设鲜艳飘扬的大党旗，党旗东侧建造3名解放军相互扶持前行的雕像，西侧排布相关红色展板；台下以红白色砖交互铺设成文化广场，在广场东边建设红色文化大舞台一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夏的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据统计，活动于宁夏境内的土匪有大小130余股近万人，经常出没于平罗、惠农、贺兰、永宁、宁朔等沿贺兰山地带以及同心、盐池和时属甘肃省的海原、固原山区。他们以反动军官、特务为骨干，以兵痞、贯匪、恶霸、地主为主要力量，打家劫舍、断绝交通、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袭击基层人民政权，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在匪患中，危害最大的是郭永胜股匪。1950年3月，刚投诚不久的马鸿逵“贺兰山警备司令部”原司令郭永胜经过3个月的密谋策划，以开展生产为名，再次聚众上山为匪，以打硿口（今大武口）以北山区为据点网罗匪党六十余人，组成“贺兰山剿共总部”，自封司令，号称“贺兰王”。郭永胜指挥匪帮开始活动于北岔口、简泉子北山等地，后经解放军于归德沟打击后，即分散潜伏，寻机作恶。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宁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清匪镇反运动。1950年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接受命令，进山剿灭以郭永胜为首的土匪，并组织地方民兵积极配合。土匪虽然穷途末路，却十分猖狂。3月14日，郭永胜带领土匪伏击了五八二团两个班；16日，在王泉沟伏击一九四师教导队生产人员二十余人；4月21日晚，在三区一乡枪杀惠农县政府科员闪文斌；23日至24日，抢劫二区一乡、三乡的马家、张家、何家等，其中纵火烧死何家七口人；25日晚，用绳子勒死潮湖堡上庄子村村长吴国泰。此外，郭匪还抢劫了大武口新华瓷厂，并将厂长刘万忠、主任李锁魁、干部陈寿田用绳索勒死投入炭井；杀害了下庙小学校长张梯、农会主任胡凤山、文书李文录；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也在由银川回定远营途中被杀害。匪徒还多次抢劫山前山后的村庄和行人，杀死数名无辜群众，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

当时在简泉村安家庄驻扎有1个连的解放军。3月，从银川方向来了3名解放军，到安家庄途径石家庄子时，3名解放军骑的马匹怎么打都不往前走了。他们看到天黑了，石家庄子又比较坚固，户主石杰还是简泉村的副保长，就借宿于石杰家中。

但是，3名解放军的借宿过程被在贺兰山石坡子顶上的土匪发现了。当天半夜，潜伏在简泉村的土匪线人刘成显就带领土匪们来到石杰家，趁3名解放军熟睡之际，先将他们的冲锋枪抢去，再把他们捆绑住，在押送回匪巢的路上，途经郑家沟山崖时，3名解放军宁死不当俘虏，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3名解放军牺牲后，所骑的马匹自己跑到安家庄，驻扎在安家庄的部队发现后，遂着手进行调查。后根据被俘的土匪交代，解放军在郑家沟的悬崖下找到了3名烈士的遗体，其中一名烈士的遗体还悬挂在悬崖中间的榆树上。解放军和简泉村的村民用简泉村庙上的门板把3名烈士的遗体抬了下来，第二天送到雁窝池村安葬。1980年，3名烈士遗体被迁移到石嘴山市烈士陵园安葬。1950年9月，宁夏剿匪部队的战士们在深山老林之中活捉了郭永胜。11月9日，人民解放军经过审理并报请最高法院批准，在银川城内东校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判处悍匪郭永胜死刑，当即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目前，烈士崖已成为石嘴山市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人们在这里聆听烈士的光辉事迹，瞻仰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转化为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动力。

（据宁夏党史教育）

“石嘴山”的变迁

“石嘴山”最早见诸于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为山名：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据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在石嘴山（今惠农区）黄河大桥以北几公里处，黄河西岸的贺兰山余脉在河水长期冲刷下，形成山石重叠、犬牙交错的河岸高地，“突出如嘴”悬于河边，是为“石嘴山”。史籍中多称为“石嘴子”“石嘴山”“石嘴子山”等。需要说明的是，1959年，在宁夏为设置石嘴山市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由于使用了“石咀山”这一不规范的写法，故1960年被国务院的设市决定沿用“石咀山”为市名。所以过去曾一度在报刊、文件等中有“石咀山”“石嘴山”并用现象。本文所说的“石嘴山”，并非指今天石嘴山市全境，而是历史上曾隶属平罗县、惠农县的“石嘴山镇”，也即后来的“石嘴山区”。

石嘴山位于市境东北角、自治区最北端，居黄河西岸，地处宁蒙交界处，东临黄河，隔河与内蒙古相望，西依贺兰山，南接宁夏平原，北与内蒙古乌海市毗邻，2000年区域面积37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8.72平方公里。

明初，石嘴山区境内修筑“镇远关”“黑山营”等军事设施，成为宁夏的北部门户。嘉靖十年（1531年），明王朝弃镇远关退守北长城一线，区境成为蒙古部落的牧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黄河西岸驻牧的蒙古部落渡河东迁。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派通智等来宁夏主办水利事务，石嘴子位于惠农渠入黄河处，开始垦荒移民，属平罗县辖。雍正十二年（1734年），官府将蒙汉贸易“市口”从柔远堡（今平罗县）移至石嘴山。乾隆初，石嘴山成为清代河套地区蒙汉贸易的重要市场。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记》载，石嘴子一带的石料、煤炭、铁、陶土资源，在修筑水利工程和新渠、宝丰二城的工程中，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平罗纪略》·卷八）。雍正七年（1729年），石嘴山改由新设的宝丰县管辖。乾隆三年（1738年）大地震后，石嘴山仍划归平罗县。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廷决定在石嘴山设主簿，管理蒙汉事务（《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据《平罗纪略》载，当时的石嘴山除“主簿署”外，还设有把总署、监夷厅、税厅、东夷厅、西夷厅等管理机构。

光绪六年（1880年）后，驻天津的英、德洋行陆续在石嘴子设置了10家分行。将在甘、宁、青收购来的皮毛在此集中打包，经黄河水运至包头转陆路运抵天津出口，石嘴山成为外国洋行在西北经营皮毛买卖的主要据点。清末民初的石嘴山，号称“水路冲衢”，“各洋商均集于此，货财山集”（《朔方道志》·卷二十六），经历了一段商贸“繁荣”时期。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石嘴山地区，石嘴山宣告解放。解放初，石嘴山为惠农县第八区的一个乡。1950年，随着惠农县行政区划的调整，石嘴山改为惠农县第一区的四乡之一。1951年，石嘴山被划为惠农县的三个城市地区之一。1956年1月，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在石嘴山成立，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发。同年8月19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石嘴山乡改为乡级镇。1957年1月3日，石嘴山镇改为区级镇。1958年8月，中共石嘴山工作委员会在石嘴山镇成立。1959年1月25日，惠农县由黄渠桥移至石嘴山镇。

1960年3月石嘴山市建市时，石嘴山镇成为市党政机关驻地。为加强城市管理，建市初曾在区境内设“第一区”和“第二区”。1962年5月，两区合并成立“城区”。1973年7月，银北地区成立时，市级机关仍驻石嘴山。同年8月，城区撤销。1975年11月银北地区撤销后，市级机关迁往大武口，同时设置三个城市区，石嘴山为二区（1981年4月改为石嘴山区），并将园艺公社划归二区管辖。

1987年1月23日，惠农县恢复建制，将原属郊区的园艺乡一、二、三队划归石嘴山区管辖，1988年合并为“沿环村”。

2001年，石嘴山区辖6个街道办事处、50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2.6万人。2004年初，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按照小县并大县、撤乡并镇，压缩编制，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思路，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惠农县和石嘴山区，合并两县区，成立惠农区。至此，石嘴山由解放初期的石嘴山镇、后来的石嘴山市二区、石嘴山区，发展到今天的惠农区，在变迁中不断发展。

（据《石嘴山往事》）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中）

二、动员群众写稿的方式方法

革命情境下，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如恩格斯所言，个体“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只有当群众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力，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为了转变群众作为被动受体的传播角色，共产党人将工农群众培养成为党报的通讯员，使个体由“向我宣传”走向“我要宣传”。

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鼓励根据地各行业的群众踊跃投稿，将日常生活中的意见、发现，或是工作经验等向党报反映。至此，根据地的宣传方式开始转变为媒体与读者之间的双向沟通。群众通过参与工农通讯员相关活动，实现了自我动员，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生动例证。

问题是，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动员其参与新闻写稿，显然存在一定困难。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地识字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虽然党通过夜校、识字组、扫盲学校等方式推广识字，但群众的写稿热情不高。

部分群众认为，自己既非名人又非专家，无名人物的稿件不会被录用，最终放弃写稿、投稿。同样，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也未能得到重视。在陕西省志丹县，许多读者说只要埋头苦干就是了，甚至讥讽报社“吹吹打打顶啥哩！”“工作不搞，专搞新闻政策，是夸夸其谈”。

群众对待办报的态度固然反映出小农思想的局限，但也表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必须与乡村社会建立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发挥效用。为此，党的宣传部门站在群众的角度分析问题，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形，开展通讯写稿的动员工作。

（一）写作与群众需要相结合

如何动员群众参与办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应在群众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为改变根据地群众对党报工作和新闻写稿的偏见，报社要求新闻工作人员收集新闻材料时，务必深入群众。

在关中分区，记者采访时携带药包，遇病人即予急救，同时为乡村群众送去画报，提供文化食粮。为了避免采访工作占用群众过多时间，记者有时会在协助群众挖地、锄草和碾场中收集通讯材料。与采访对象探讨问题时，报社人员询问群众对边区建设的看法与诉求，并向各级机关反馈，商定解决办法。

同时，宣传部门鼓励群众多写身边的事情，多写自身的工作，识字困难者也可以和知识分子合作写稿。结合日常生活进行写作的要求，使群众意识到新闻工作不是事不关己，而是就在自己身边，不仅不会妨碍生产劳动，还能够帮助他们反映意见与诉求，解决实际困难，这样群众逐渐产生了对报纸的兴趣。与群众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了，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也就逐渐具备了社会基础。边区文化协会委员作家周而复感慨道，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分布着党报的通讯员，群众凡是有意见都可以及时反映到报纸上。

（二）创新动员方式方法

在激发了个体参与写稿的热情后，工农通讯员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又面临另外一些问题：农村群众缺少必要的写作能力，党报应如何保证稿件的质量？如果为了维持群众的写作情绪就采取“有闻必录”的方针，不仅会违背新闻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符合党报启蒙群众思想的初衷。

实际上，农村记者在经过写稿、投稿、退回、修改之后，才可能在党报上发表文章。如果稿件被报社退回，工农通讯员的积极性势必受到影响。比如，有群众说：“我寄过一次新闻给采访部，他们不用，我以后就不敢写了。”农民对于写稿的消极心理，既有文化水平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战争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因素。根据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的调查，农民在生产战线上具备十足的积极性，但对教育工作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事实上，如何走出生存困境，是整个边区都面临的难题。相比之下，要求个体耗费时间和精力写稿，便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尽管报社以支付稿费、赠送衣物等形式鼓励通讯员投稿，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对于寻求生存的农民而言，其写作热情的不稳定性可以想象。

面对这些问题，边区各报社开动脑筋，多方寻找解决方法。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强调，工农通讯员虽然不具备新闻写作的专业技能，但是经过长期的耐心帮助，他们的写作水平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一是热情鼓励、耐心帮助。比如，边区群众报社要求审稿人员做到每信必复，退稿信件应如同给家里人写信，坚持做到尊重作者、爱护作者、悉心帮助，批注出具体意见，给予鼓励，不能挫伤其写稿积极性。为了系统传授写稿知识，提高审稿效率，有的报社还开设了专栏。

如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创办的《大众习作》，设有《原作与改作》栏目。该栏目修改群众投稿，连同原稿刊登，将二者进行对比，向读者详细说明如何写作。在新闻工作者的耐心帮助下，群众写稿和投稿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工农通讯员陈玉珂表示，报社在退稿信中指出文章的优缺点，“并告诉我不能发表的原因。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使我很感动，因而又鼓起再写的勇气”。通讯员许海珠出身农民，起初不会写稿，但后来经过报社鼓励，采访热情高涨，主动外出收集新闻素材，之后自己不断练习，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鱼沟壕的大块水漫地》一文。

二是讲究实效、不拘形式。例如，解放日报社提出，通讯人员可以将个人日记改编为新闻稿件，无需拘泥于特定格式、体裁。以通讯员郝效方为例，其日记内容涵盖三边分区的农村中心工作，如拥军优属、教育、发动春耕等，其中不少内容反映边区社会动员的相关问题。

例如：“上午下了一阵毛毛雨。下午去马坊掌开自然村会议，据张成贵谈一般群众反映，在生产中有两个问题，他们以为发展牧畜与发展农业有矛盾；公家发动群众多种油籽，秋征时，是不是要加征油籽呢？”这则日记虽然简短，但从中可以看出群众关心的生产问题，也反映出群众对于政治事务的疑问。

通讯员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相关线索，详细收集信息并加以思考，将许多看似平常的日记改写成为很有价值的稿件，丰富了通讯稿源。而且，与新闻报道相比，日记内容较为真实，包含个人生活经历、思想活动、人际交往等描写。通讯员将日记改写为新闻稿件，既降低了写稿的难度，又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边区的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认识到，宣传鼓动的内容必须抓住群众身边的事实和动人事例，才易于激起群众的感情。“做什么、写什么”的写稿要求旨在引导群众观察生活中政治事务的运作规律，在实践中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边区群众报社曾发出公告，鼓励工农通讯员的写作应侧重描述劳动英雄代表回村的情形：群众的欢迎情形，劳动英雄的宣讲内容，村里组织劳动力的方式，本村本乡群众在劳动英雄的领导下，生产情绪提高的表现等。

在加入报纸“执笔人”的队伍后，群众开始观察和了解政治事务。这样，农民就不仅是接受信息的客体，也是主动分享、参与传播的宣传者。事实证明，在宣传工作贯彻群众依靠群众思想的指导下，报社通过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动员农村群众成为党报通讯员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使“群众办报”真正得以实现。（未完待续）

（据《党的文献》）